

“一國兩制”構想之創新與可創新性探討

孫代堯*

“一國兩制”理論是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最有特色也最具創意的部分。這一創造性構想的提出，既與鄧小平的個人特質有關，也有現實的前提和科學的方法論依據。作為中國國家統一的制度設計，“一國兩制”是立足於時代發展和中國實際的科學構想，同時也有待於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創新。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一、“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價值

1. 對國家理論和國家結構的創新

自民族國家形成以來，傳統的國家形態都是“一國一制”，即在一國內部，只實行一種類型的社會制度，並以憲法形式固定下來。無論採單一制結構形式的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均不例外。上世紀初，世界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類型社會制度並存的格局，也有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類型的憲法，但無論哪種類型的憲法，都只保護一種類型的社會制度及其相應的政權組織，所以“一國一制”是傳統國家形態及相應憲法體制的常態。

但是，按照“一國兩制”構想，允許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內，有兩個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長期並存，“這是史無前例的”¹，是對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內的傳統國家理論的重大突破和創新。雖然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客座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學博士。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57頁。

在馬克思之後，列寧在探索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時，曾經提出要對外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繫，對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發展，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但“一國兩制”構想則把“利用資本主義”擴展到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存在幾個資本主義地區並長期不變。社會主義國家既可以為作為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也允許和保護一定地區範圍內存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國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馬克思沒有講過這個問題，我們大膽地提了，如果不這樣設想，絕對不可能統一。”²

“一國兩制”發展出了一種新型的國家結構形式。我國是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國家，是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由若干地方行政區域單位組成的單一主權國家。但自“一國兩制”構想提出後，1982年新憲法增加了“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的規定，其後並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確授權特別行政區以高度自治權力，涉及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財政經濟、社會文化和對外交往等各個方面，這些權力不僅大大超過了傳統單一制下地方自治的權限範疇，在很多方面也超過了聯邦制下各成員國的權力。如同參與起草了港澳兩部《基本法》的蕭蔚雲教授指出的：特別行政區“這種高度自治權比我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要高，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地方自治的權限要高，甚至比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國的某些權限也要高。”它“是具有新的特點的地方自治，是‘一國兩制’下的新型的地方自治。”³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楊允中教授也認為，在“一國兩制”下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使原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制度開始含有聯邦制的特點，即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或者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已不再是單一的中央集權制，而是結合了聯邦制和單一制兩種形式的特點。特別行政區既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又可以實行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享有和行使後者無法比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57頁。

3. 蕭蔚雲《論澳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69頁。還可參見蕭蔚雲《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94—296頁。

擬的高度自治權。這就使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帶有了複合制的某些特徵。⁴

2. 和平共處原則的拓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中、印等國首先倡導，其後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同的處理國與國之間相互關係的準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是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堅持了和平共處精神，又創造性發揮和靈活運用了和平共處原則。即把這一處理國際關係的原則拓展到處理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上，用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之間的關係問題，以達致一國之內兩制之間的“和平共處”。鄧小平說：“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種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⁵

在和平共處原則下，一國之內實行兩種不同制度的地區，其關係模式應當是：互相尊重各自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中央和內地省區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特區也不干涉中央和內地的事務；雙方和平共處，互利互惠，相互支援，共同發展。

3. 未來中國現代化發展圖式的繪製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想，首先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基於中國國家統一需要而作出的一種制度安排，但同時也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模式的一種宏大構思。

4. Ieong Wan Chong, Ieong Sao Leng, et al., “One China, Two Systems” and The Macao SAR, Macao: Centre for Macao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cao, 2004, pp.233-234.

5.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97頁。

“一國兩制”是和平與發展時代的產物，與東亞崛起相契合。戰後亞太地區的繁榮、東亞的崛起，給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因為我國正處在東亞。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兩岸四地的中國人以各自優異的表現做出了巨大貢獻，表明中華民族有能力抓住機遇。東亞的高速發展也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不要說經濟停滯，就是發展慢了，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一比就有問題了。對戰後東亞的崛起，鄧小平有親身體驗和清醒認識。1978年5月，鄧小平說：“現在東方有四個小老虎：一個是南朝鮮，一個是臺灣，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新加坡。它們的經濟發展很快，對外貿易增長很快。它們都能把經濟發展得那麼快，我們難道就不能嗎？我們的腦子裏還都是些老東西，不會研究現在的問題，不從現在的實際出發來得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樣天天講四個現代化，講來講去都會是空的。”⁶ 同年9月12日，鄧小平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⁷ 11月14日，鄧小平在新加坡訪問時說：“大家要開動腦筋，有的人總認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國際上比，不要與國內的比。”⁸ 直到1992年初南方談話時，鄧小平還告誡國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⁹

為了抓住機遇，回應挑戰，鄧小平及時地作出在鄰近港澳臺的地區設立經濟特區、進而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決策。東亞崛起之日，正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強勁發展之時，為了回應這種挑戰，需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加強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四方的合作。因此可以說，“一國兩制”之構想，既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富有想像力的思路，也是對21世紀中國現代化發展圖式的勾畫，這一圖式是：在一國版圖內，在兩種制度下，通過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港澳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臺灣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模式，大陸的社會主義市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67頁。

7. 同上，第76—77頁。

8. 同上，第91頁。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

場經濟模式)，香港、澳門、臺灣和大陸四方緊密合作走向現代化。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鮮明特色，也是當今世界最獨特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它不僅反映了“一國兩制”的中國特色，因為這是中國獨有的；而且反映了“一國兩制”的時代特色，因為它體現了時代的精神。

4. 解決國家間衝突的新思維

香港、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涉及中英、中葡之間的關係，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有外國勢力的干涉。這使解決港澳臺問題具有相當的複雜性，需要找出一個圓滿妥善的解決方式，以保持和發展中國同有關國家的關係，維護世界和平，從而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野和思維，為解決國際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範例。鄧小平說：“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¹⁰ “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¹¹ 正因為如此，“一國兩制”構想提出後，受到世界輿論的廣泛讚譽，被認為是解決當今世界難題的一個最佳辦法。

從“一國兩制”的思路出發，鄧小平還進一步設想：對於有些國家之間存在的領土爭端問題，如釣魚島問題、南沙群島問題、馬爾維那斯群島（福克蘭群島）問題等等，是否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雙方相互讓步，共同得利。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

1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9—60頁。

11. 同上，第68頁。

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可以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有些還可以用‘共同開發’的辦法。”¹² 作為“一國兩制”構想之延伸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新思路，是鄧小平對世界和平的又一個重要貢獻。

二、創新的源泉

1. 鄧小平的非凡品質與個人信念

“一國兩制”構想凝聚了中共兩代領導集體的智慧，但它首先是和鄧小平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這其中，我們不能忽略鄧小平的個人特質。

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形成於其人生經歷和經驗，而體現在其思想、性格和行為上。鄧小平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青年時期曾遊學歐洲（1920—1926年），先後在法國勤工儉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此期間，鄧小平經歷了艱苦生活的磨練，也使他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和堅定了振興中華的信念。後來他曾對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教授說：我從青年時就有了這樣的理想，一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二是愛國主義，振興中華民族。¹³ 回國後，鄧小平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在黨軍部門擔任重要職務。在此期間（1933年），他曾因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抵制中共黨內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遭到排擠和打擊，被撤銷職務並受到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江西中央蘇區一個邊遠縣的區委當巡視員。這是鄧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落”。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成為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鄧小平被誣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於1969年和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這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落”。鄧小平後來在回答外賓問他“最痛苦的是什麼”時曾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¹⁴ 1975年1月，鄧小平受命主持黨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7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28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4—55頁。

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因試圖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鄧小平在當年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次受挫。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他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鄧小平的第三次“落”。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中國的歷史也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鄧小平在他“三起三落”的傳奇式坎坷政治經歷中，練就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堅強樂觀、現實主義、敢開風氣之先的偉大政治家的氣魄和膽略。鄧小平之所以能在中國面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扮演決定性角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創造性地提出包括“一國兩制”構想在內的具有鮮明時代氣息和中國特色的新理論，是與他的上述品質分不開的。1986年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可以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歷，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¹⁵ 這一系列政策，即包括了“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理論是以它的創立者的名字——鄧小平，鑄刻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豐碑上的。

2. 創新的現實前提：改革開放和中國的重新崛起

“一國兩制”構想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成型，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分不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為“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歷史是一面鏡子。香港、澳門從失落到復歸，映照的是中國從積貧積弱到重新崛起。在鴉片戰爭以後的漫長歲月裏，中國人民和歷代政府為收回香港澳門主權作出了種種努力，但都因國家貧弱和政府的腐敗無能而未能如願。1842年，鄭觀應在一篇時評中寫道：當朝既與列強簽下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弱國必不免受辱。如積弱自安，不能振作，雖有百部國際公法，有何補哉！1868年，清政府得知法、德、美、俄等國均有意從葡萄牙人手裏購買澳門的打算，曾考慮出100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69頁。

萬兩白銀的高價“償金”買回對澳門的管理權。此事雖因當時葡萄牙國內政局動蕩而中止，但中國人竟然要出錢買回自己的國土，看似十分荒唐的事折射的正是中國國力的衰敗。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政府企圖在“傾斜的談判桌”上實現港澳回歸的努力也均告失敗。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之遺訓難以促成，幾代人的統一之夢難圓。

1949年新中國誕生，中國終於擺脫了一百多年來備受外國列強欺辱的歷史，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從而為最終收回香港和澳門創造了先決條件。但出於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保留香港、澳門這一傳統的“窗口”和“國際通道”的考慮，在1978年之前的30年裏，我國政府對香港、澳門問題採取了“暫時不動”、“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待時機成熟後通過談判解決的方針。這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從實際出發，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大手筆。1971年10月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後，我國政府隨即又向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委會特別指出：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把香港和澳門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這是中國政府又一極具遠見卓識的戰略考慮，既排除了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介入港澳問題的可能性，又完全避免了類似世界其他“殖民地”地區通常出現的由當地公民“公投”決定其歸屬的後果。

1978年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談判地位顯著提升，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審時度勢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通過中英、中葡和平談判實現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作為後盾，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主權回歸的想法很有可能不被他人接受。換句話說，正因為有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崛起，我們才有力量搞“一國兩制”。1984年，鄧小平這樣講道：“香港問題為什麼能談成？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什麼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

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¹⁶ 當鄧小平強硬地向撒切爾夫人和葡方代表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決不允許將殖民主義的尾巴帶到下個世紀”的時候，代表的是一個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國的聲音。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中報》發表評述，指出：“中國一定要在本世紀以內收回澳門，這一聲音，若發自80年前的滿清王朝之口，說不定又會引起‘列強’們的一番干涉，再演出一場‘八國聯軍’血洗京、津的慘劇；若這一聲音發自半個世紀前的國民黨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國也完全可能一笑置之，或者出現一場外交危機。甚至，這一聲音出現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政府之口，都有可能引起一場不愉快的糾紛。但是今日，在一片逆流的聲浪中北京一發出主權的聲音，嘈雜的聲浪立即消弭，葡國政府也只得順應了潮流。……這一不平凡的現象，足以說明中國的強大，以致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不注意到它的聲音和它的意見。”香港、澳門的得失，恰與中國的興衰相契合！

如果說，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的前提，那麼，實行“一國兩制”長期不變，則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鄧小平多次指出，承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不只是為了安定人心，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而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考慮到這幾個地區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密切的關聯，即：中國要實現“三步走”、在21世紀中葉完成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 → 需要擴大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 港澳臺地區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 繼續發揮這種作用的前提是保持這幾個地區的繁榮和穩定 → 為此需要保持其制度和發展模式不變 → 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中國同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一國兩制”的政策就更沒有變的必要了。

3. 創新的方法論依據：實事求是與“一國兩制”

1984年，當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稱讚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沒有先例的天才創造”時，鄧小平告訴她：“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5頁。

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¹⁷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邏輯起點，也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理論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在1984年發表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著名講話中，鄧小平說：“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臺灣問題。”¹⁸ 如果不是堅持從實際出發而是思想僵化或教條化，如果搞的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就不會提出“一國兩制”，就不可能容許在局部地區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不可能允許兩種社會制度同時並存。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國兩制”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延伸。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¹⁹ 而“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也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為增色，“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²⁰

建構在從中國實際出發和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一國兩制”，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也充分考慮到港澳臺地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同時也妥善照顧到一些有關國家在這裏的投資和其他利益，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切實可行的方案。

鄧小平說：“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1頁。

18. 同上，第58—59頁。

19. 同上，第217頁。

20. 同上，第218頁。

門的利益；而解決臺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臺灣的利益。”²¹ 採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式，最能充分照顧各方的利益。例如，香港是自由港和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英國在這裏也有不少利益。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需要處理好各方面的關係，解決的辦法要使中國、英國和香港三方都能接受。鄧小平說：“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²² 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既符合中英兩國的利益，也符合廣大港人的利益。同樣，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澳門問題，既符合中葡兩國的利益，也符合廣大澳門居民的利益。臺灣問題歷來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關鍵。鄧小平說：“如果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統一，美國利益也不致受損害。”²³ 採用“一國兩制”方式，也符合臺灣的利益。兩岸統一後，“臺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臺灣人民沒有損失。”²⁴ 總之，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中國統一，既能體現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具有高度的靈活性，有利於保持港澳臺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居民安居樂業，也有利於保持和發展中國同有關國家的關係，是我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三、進一步豐富和創新“一國兩制”

從1978年11月鄧小平在同緬甸總統吳奈溫的談話中首次表述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臺灣問題²⁵，到1982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²⁶，直到1990年9月鄧小平最後一次發表關於國家統一問題的講話，“一國兩制”在鄧小平時代從最初的一個關於國家統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81頁。

2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1—102頁。

23. 同上，第97頁。

24. 同上，第170頁。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91頁。

26. 同上，第212頁。

一的戰略逐步上升為理論，從一個概念發展成一個內容逐漸豐富的理論體系，並在其後光輝地經受住了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和回歸後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的兩度檢驗。

但是，“一國兩制”仍然可以創新也需要創新。謂其可以創新，是因為鄧小平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具有與時並進的理論品質。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同時，也提出了“堅持鄧小平理論，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這個理論”的重大理論創新任務，這無疑也包括了作為鄧小平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理論。“一國兩制”構想本身就是理論創新的產物，也內在地包含了可檢驗的意涵和進一步創新的要求。謂其需要創新，是因為“一國兩制”是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時空環境下形成的理論建構，是從當時已有的經驗材料出發的，它沒有也不可能對未知的事情和在實踐中必然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作出先知先覺的解釋，提供一勞永逸的答案。這也正是“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之所在。

鄧小平曾說：“‘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²⁷鄧小平在世時，港澳尚未回歸，“一國兩制”還處在理論化與法制化的階段，尚未進入實踐層面，因此它不可能是完全經驗知識的概括，而是一種建立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的理論構想，是一種帶有原則性和高度概括性的“理念型”(idea type)建構。這是科學“範式”(paradigm)革命的共通特點，當然無損於“一國兩制”這一理論範式的科學性，惟其需要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並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創新。這一點，也同樣體現在港澳基本法這兩部原創性的法律中。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基本法得到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妥善地處理了涉及港澳政治、經濟、社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領導和團結各界人士，正確處理穩定、發展和改革的關係，克服了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為保持兩地的繁榮、穩定和發展作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初步的，但是十分寶貴的，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構想具有可操作性和強大生命力。

2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1頁。

但毋庸諱言，尚處實驗期的“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事先沒有預料到的新問題和新矛盾。這其中，港澳兩地因歷史和區情差異，“一國兩制”的實施績效和出現的問題有所不同。在未來的實踐中，“一國兩制”也必然會繼續面臨新的挑戰。這是不足為怪的。香港回歸只有七年，澳門則不到五年，如果以“五十年不變”為標準，“一國兩制”還處於童年；如果把“一國兩制”比喻為一顆參天大樹，它現在還只是一株幼苗，遠未成長得枝繁葉茂。未來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的問題或矛盾，除了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外，要做大量具體細緻的工作，更需要有創新性的思維，在創造性地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展這個理論。對此，中央政府固然責無旁貸，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也肩負重任。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也呼喚著“一國兩制”構想的進一步具體化和創新。臺灣問題和香港澳門問題在性質上不同，複雜程度和艱巨性更甚。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有賴兩岸人民的智慧和想象力。比如，對“一中”內涵的解讀、在臺灣實施“一國兩制”比港澳更寬鬆的尺度把握、“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內涵和外延、臺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和國際活動空間問題等等，非有創新思維難以解決。在統一問題上，兩岸都需要坦誠、善意和務實，也需要創新、浪漫和詩意，而不是對抗、敵意、守舊和單贏。若能在一個中國的大屋檐下，兩岸四方攜手，抓住新機遇，創造新動力，建立新結構，則中國將譜寫這個世紀的經濟篇章，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的復興。

